创新发展观的开拓性力作

—— 评《自组织理论与社会发展研究》

洪 星 范

(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, 上海 200235)

[中图分类号] C911 [文献标识号] E [文章编号] 1004-3489(2004)06-0077-02

2003年秋,中共16届3中全会正式确立了"全面、协调与可持续"的科学发展观。这是第四代领导集体在我国现代化进入关键时期应对新挑战,为完成新任务而实现的一次意义重大的理论创新。从胡皓的《自组织理论与社会发展研究》(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)中可以清晰地发现:该书对科学发展观从它的科学基础、内在逻辑到它的应用,都已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。

作为这本书的责任编辑,我知道其出版与科学发展观的正式面世并非一种纯粹偶然的巧合,而是早已"有备而来"。当作者还是一名本科三年级学生时,出于对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反思,他与另两位同学发表了国内第一批讨论"异化"与"人道主义"的论文。但是,在深入思考时他发现,对人与社会发展问题,康德与黑格尔等古典哲学大师们早已作过许多深刻的论述,马克思更创立了唯物史观。也就是说,在哲学思辩的层面上,社会发展问题原则上已经解决。那么,今天有必要超越上述那些哲学社会科学的限制,从以现代物理学为基石的现代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最新进展中,寻求某些启示,在新一代马克思主义传人的手上,实现发展观的再一次创新?

按照他当时的思路,人类社会的发展固然因其特有的极端复杂性,并非简单照搬某些自然科学理论可以直接解决。但是,如果我们不将社会的进化—发展现象神秘化,而将社会的进化—发展也视为广义自然界诸多进化—发展现象中的一种,而且本身就是广义自然界长期进化—发展的结果,那么,我们就不能不承认,人类社会的进化—发展发展,毕竟也服从广义自然界所有进化—发展现象的某些最一般的规律。因此,如果我们发现并全面和准确地掌握了这些最一般规律,无疑有助于我们认识和处理好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各种问题,尤其是其中的一些最基本问题,以避免产生片面性,至少可以避免产生一些较大的片面性。而这种可能性也已经出现了。其中最有影响的成果,就是当时正迅速酝育之中的耗散结构论等通常被称作"非平衡系统自组织理论"的一组新科学理论群。这组理论尽管学科背景不同,概念和方法也有异,但是,它们却共同聚焦于组成系统的大量子系统,如何有可能自己组织起来,实现从无序到有序(或从较低级有序到较高级有序)进化—发展的一般条件、机理和规律性。

由于这组理论组毕竟学科背景不同,概念和方法也有异,而且它们又直接出自于自然科学,为了在将这组理论运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发展时避免出现"生搬硬套",达到"融会贯通",并尽可能接近"出神入化"的境界,他化了很大功夫,先做了两步工作。

?1994-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http://www.cnki.net

第一步，将上述这组自组织理论在元科学层面上进一步打通，将其概括上升为“一般进化—发展论”。他在这方面发表的一组系列论文，也为国际学术界这一领域的旗刊纽约出版的《世界未来》摘要刊登，受到国际同行的认可与关注。该刊在其“工作进展报导”专栏，还发表了原联邦德国哥廷根大学 G. Campis 教授介绍本人研究工作的一篇幅专题报导。而这一领域内伦敦出版的另一期刊《社会与进化系统》的主编在看到那篇报导后，也专门致函他约稿，并在其来函中言词恳切地表示，希望在他主编的该刊上“每年都能读到”他的论文。

鉴于人类社会毕竟是自然界中极为复杂的一个层次，他的第二步工作，就是在逻辑上寻找将一般进化论运用于具体研究人类社会进化—发展的逻辑上的“中间环节”，试图在哲学层面上建成构了一个人类社会的系统模型。

随着研究的深入，尤其 1992 年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前后，由于上述研究进程本身的内在逻辑，他的研究主题自然地由原先的“发展何以可能？”推进到“持续的发展何以可能？”其主要成果体现在专著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与实践》（陕西科技出版社 1998 年）。在那本书中，他明确地提出了“超系统思维”。其核心思想，就是强调相关系统之间通过在空间维度上的“错位发展”与“优势互补”，实现在时间维度上的“可持续发展”。也即强调对相关系统要“统筹兼顾”与“协调发展”，以“全面与协调”之因，求“可持续”之果，明确了这一发展观的内在逻辑：只有当发展是“全面与协调”的，才是“可持续的”。

作者在书中已经运用上述创新了的发展观即“超系统思维”讨论了我国现代化进程。而他所以能领先一步进入这一领域，却来自于如下的一种洞察：按照二战后许多“后发现代化”国家现代化的历史经验，当一个社会的现代化过程经过一个高速增长的“起飞”的早期进入其中期后，作为一种普遍的带有规律性的现象，社会冲突都会趋于激化，现代化将进入“高敏感度”的关键时期（可将其比喻为“易颠簸期”）。在这一时期，决策者将面临一系列令人左右为难的“两难困境”。如经济效率与公平分配何者优先的“两难”、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何者优先的“两难”、国家主权与对外开放何者优先的“两难”以及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何者优先的“两难”，如此等等。他将这些“两难”问题称作“后发现代化的悖论”，因为两个命题“同时为真”（“同样重要”）但直接地却“相互矛盾”（实行时具有相互抑制的“不相容性”）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如果决策层的发展战略恰当，社会冲突有可能得到化解，现代化进程便有可能得以继续而成功地完成；相反，如果发展战略不恰当，或原来的发展战略未能适时创新，社会冲突进一步激化，就会导致现代化“受挫”，陷于停滞甚至倒退。一个明显的对比就是，20 世纪 70 年代后期，韩国、新加坡这两个东亚国家与巴西、阿根廷这两个拉丁美洲国家的人均 GDP 差不多都同时达到 3000 美元左右。但前者适时地调整了发展战略，首先是兼顾了经济增长与其成果的公平分配，接着再经过 20 来年的持续发展后，人均 GDP 先后突破了一万美元，进入了发达国家行列。但是后者却未能适时创新发展战略，首先是依然坚持原“先增长，后分配”的战略，国民收入的两极分化越来越严重，社会冲突加剧，现代化进程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。

中国 20 世纪 90 年代进入 GDP 年均增长率 10％左右的“经济起飞”后，鉴于上述其它国家与地区现代化历史经验，他意识到中国经济起飞的这种势头如果再持续一二十年，也将会进入一个“高敏感度”（易起“颠簸”）的关键时期，届时，也将面临发展观创新调整的必要性。为此，他有意识地将研究更集中地转向用上述“超系统思维”求解“后发现代化的悖论”。其实际内容也就是现在党中央所强调的五个“统筹兼顾”。

（责任编辑　匡四）

?1994-2017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